



從帝國撤退到大國競爭



戰略縱橫

劉兆佳

十八世紀中葉，美國人以革命方式推翻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並建立了一個沒有君主制度、崇尚個人自由和有限度民主的共和國。

長期以來，美國人不斷吹噓美國立國精神的核心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統治。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中，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更大力推動「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但這個原則卻只限於在歐洲實施，而其他非白種人地區則被排除在外。

既然美國人覺得自己曾經是殖民統治的受害者，因此一直表示對帝國主義深惡痛絕，當然這其中也與爭取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有密切關係。二次大戰後，美國一度嘗試瓦解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的殖民帝國，從而擴大美國的海外市場。然而，由於不旋踵東西方冷戰爆發，為了遏制蘇聯，美國轉而竭力維護歐洲國家帝國的完整，並讓自己處於反帝和反殖力量的對立面。

歷史上，美國一直信誓旦旦表明無意建立「大美帝國」（American Empire），強調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與其立國精神相牴觸。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美國在立國後便大量以武力和非武力、公開和隱蔽手段建立一個橫跨五大洲的「大美帝國」。在建立「大美帝國」的過程中，美國早期較倚重奪取殖民地或在其他地區進行直接管治，比如在菲律賓和波多黎各，而在二次大戰後則主要通過軍事、外交、金融和經濟手段，利用各種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比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北約（NATO）對其他國家實施控制和霸凌和制定對自己有利的國際遊戲規則。

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A.G.霍普金斯（A.G. Hopkins）在其巨著《美國帝國：全球史》（American Empire：A Global History）（2018）中斷言，在建立帝國過程中，美國與歐洲國家在方法和軌跡上並無二致，都是主要用武力掠奪的方式侵佔其他民族的土地、霸佔其資源和壓迫其人民。不過，由於反帝和反殖浪潮在一次大戰、特別是二次大戰後席捲全球，沿用帝國擴張、土地佔領和殖民統治方式來建構帝國在政治上越來越艱難，所以美國才不得不更多採用「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方法來實現帝國野心。所謂「間接管治」，是通過美國在不同國家和地方培植、支持和控制的當地代理人來「代替」美國進行管治。這點在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學教授戴維·A·萊克（David A. Lake）的近著《間接統治：美國國際等級制度的形成》（Indirect Rule：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2024）中有詳細論述。

直到最近十多年左右，美國人仍然非常抗拒「大美帝國」的稱謂，認為這是對美國的污蔑。相反，他們認為美國實際上是在建立一個對世界和平、人類發展、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有利的國際秩序，並勉強可以稱之為「美國治下的和平」或「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不過，最近一段時間，越來越多美國學者不但對「大

美帝國」一詞不掩飾、不迴避，反而肯定之和對之讚譽有加，認為它是美國人給全世界提供的最佳的公共產品，並相信「大美帝國」符合全球人民的利益和渴望。來自英國的美國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人：美國帝國的興衰》（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2005）的書中對「大美帝國」對人類的貢獻更褒揚備至，但唯一感到遺憾的是不少美國人對建立「大美帝國」的思想心態和政治決心不夠投入和堅定而已。

軍事經濟脅迫當美國附庸

在冷戰時期，「大美帝國」並不是一個橫跨全球的帝國，反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要與蘇聯乃至中國爭奪政治支持與影響力。冷戰結束後，美國一極獨霸，國力一時無兩，「大美帝國」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機會，從而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帝國。毫無疑問，美國憑藉其帝國從全世界獲得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金融利益，但卻也需要付出相當的成本，當然整體而言仍然是本小利大的一盤生意。不少「大美帝國」的仰慕者和支持者宣稱，不少國家是因為美國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有吸引力，才同意主動加入或因為收到美國「邀請」後才加入「大美帝國」，所以「大美帝國」是一個建基於各國對美國的帝國認可（empire by consent）。然而，實際情況是，美國在相當程度上依靠龐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迫使其他國家加入，而且「大美帝國」的長期維繫離不開美國的公開或隱秘的軍事威懾和經濟脅迫，美國散布在全球的幾百個軍事基地和美國援助的政治操作便是明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願意為其他國家提供經濟利益，比如開放美國市場、提供一些公共產品比如維持國際航道的暢通、阻止或消除一些地區內的衝突、促進自由貿易、推動經濟全球化、提供各類援助和服務、提供安全保障等。誠然，不少國家雖然因為加入了「大美帝國」而失去了部分主權和政治和經濟自主，遭受到經濟的剝奪和國家的尊嚴的侵犯，但還是認為作為「大美帝國」的一員是利多於弊，所以甘於充當美國的附庸。

可是，「大美帝國」近年來卻出現眾多無以為繼的跡象。

首先，冷戰結束後，蘇聯不再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因此對美國所給予的安全保證的依賴和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即便一些接近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個別區域性強國的國家還是希望獲得美國在安全上的關顧，但它們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卻實際上仍然有所減少，因此越來越多國家力圖尋求某種程度的「戰略自主」，而一些區域性強國比如印度、伊朗、土耳其、俄羅斯和巴西的崛起更削弱了美國在不同地區的政治影響力。

第二，美國創建和主導的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上的功能和角色不斷下降，其中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下降尤其明顯。當然，美國自己對那些國際組織的重視程度下降也對它們的地位和功能造成打擊。

第三，美國越來越不願意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美國的對外援助和債務減免越

來越吝嗇，尤其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期間，美國實施疫苗保護主義，讓其他國家飽受醫藥短缺之苦。在應對全球氣候危機上美國更刻意逃避作為大國的領導責任。

第四，美國的金融、財政和貿易政策不負責任，為其他國家不斷帶來痛苦。美國單方面讓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及其罔顧後果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不斷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2008年源於美國的「次按危機」的全球金融海嘯對全球國家所造成傷害迄今尚未完全平復。

第五，為了維護美國自身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美國多次在缺乏國際社會認可下發動戰爭，比如對阿富汗的入侵、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和介入利比亞內戰，讓自己和其他人付出沉重代價。

第六，美國推動北約東擴而觸發俄烏衝突，並在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軍事衝突中完全偏袒以色列，導致在歐洲和中東爆發令人痛心疾首的大規模人道災難，讓美國在國際上極為孤立。

第七，美國不斷利用人權、自由、民主或履行「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為藉口插手別國內政，策動政權更迭，分裂別國領土，惹起越來越多國家的不滿。

第八，美國對其訂立的國際制度和規則也越來越不願意參與和遵守，特別在貿易、投資、軍事和法律領域，造成了不少國際失序的情況。

第九，美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安全保證越來越不可靠，引起了不少美國盟友的擔憂。

第十，美國越來越不願意簽署新的國際合作協定，反而退出一些本已參加了的協定。

「大美帝國」逐步走向終結

第十一，美國的國內市場對外越來越封閉，而貿易和科技保護主義則越來越強烈。

第十二，美國的軟實力，無論是其引以為榮的「民主」政治、人權狀況、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都因為在美國出現了更多敗壞的現象而在世界上流失不少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十三，美國國內反經濟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響亮，越來越多美國人反對美國派兵到外國作戰。

第十四，為了遏制中國，美國不惜破壞全球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嚴重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是中國的快速和平崛起，客觀上對「大美帝國」帶來嚴重的威脅。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少國家可以減少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並且可以從中國的成功發展中取得自己獨立自主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支持。

以上各點只是榮華大者，但已經足以說明「大美帝國」走向衰敗的跡象和趨勢。

其實，導致「大美帝國」沒落的主要因素是美國絕對和相對的綜合國力特別是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持續和無法逆轉的下降。美國不斷增加和難以償還的巨額國債可謂明證。「大美帝國」在美國國內也造成了去工業化、經濟虛擬化和貧富懸殊等嚴重後果。這些情況不但使得美國越來越沒有

能力和資源去支撐其帝國和維繫其他帝國成員的效忠和支持，也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民不再願意認同「大美帝國」和為其付出代價。

過去一段時間，越來越多西方學者對「大美帝國」的前景不表樂觀，甚至認為「大美帝國」難以存續。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維克多·布爾默-托馬斯（Victor Bulmer-Thomas）在其《帝國的撤退：美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Empire in Retreat：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2018）的書中預言未來「美國將不再扮演帝國主義角色。」他認為：「美國帝國主義賴以建立的基石——『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正在崩塌，這一大廈正在帝國內部遭受挑戰。」

重要的是，美國經濟的相對沒落使得美國不能夠向世界上其他地方輸出資本，而歐洲國家的帝國通常利用其貿易順差作為資本的來源。此外，「自由貿易是美國全球帝國的基石。美國的反全球化正逐步推動美國帝國的撤退。」

曾經在1987年因為出版《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一書而聲名鵲起的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2023年9月在《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的GDP總量可能已經超過美國。這將是150年來美國首次不再擁有世界最大國民經濟的地位。」他因而詰問：「在相對生產力向東方轉移、國際權力普遍下移的時代，無論美國擁有何種優勢，它能否在各方面保持領先？如果不能，那麼它應該從全球哪些地區撤軍？它該如何應對相對的衰落？」他進而指出：「過去在全球擴張的頭號強國——西班牙帝國、愛德華時代的英國——都幾乎不可能決定處理其資產和義務的優先次序。」言下之意是美國也不會是例外，因此會做一些於事無補但對人對自己都會帶來傷害的勾當。

另外一名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查爾斯·S·邁爾（Charles S. Maier）在其《帝國之間：美國的崛起及其前身》（Among Empires：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2016）一書中強調：「現代美國帝國影響力比傳統帝國更加不穩定且脆弱。它依賴（別國的）同意、經濟相互依賴和軍事力量，但缺乏歷史上其他帝國所特有的（對其屬地的）直接行政和強制控制。這使得它很容易受到國內和國際的抵抗。」

過去十多年來，「大美帝國」走向沒落的趨勢顯然不可逆轉。因此，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揚言要「讓美國再次偉大」更像是痴人說夢。綜合而言，特朗普在其第一屆任期（2017–2021年）內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實際上有兩個：削減美國在國際上的承擔與集中力量遏制中國的崛起。其繼任人拜登總統在相當程度上其實也銳意試圖達到這兩大目標。特朗普在2025年再度當上美國總統後更馬上以暴風驟雨方式發布一大批行政命令和宣示不少政策意圖來加大貫徹這兩大目的的力度。它們包括：向世界各國發動大規模貿易戰、對中國進行更嚴厲的科技和經濟遏制、退出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試圖把加拿大、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併入美國版圖、

繞過歐洲盟友和烏克蘭直接與俄羅斯談判結束俄烏衝突、要求歐洲負起主要的援助烏克蘭的責任、力求盡快結束巴以衝突、要求盟友和夥伴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對盟友的安全保障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大幅壓縮聯邦政府的開支、把大批非法移民驅逐出境、顯著削減對外援助、基本上放棄對外輸出美國民主和價值觀、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等等。不過，這些舉措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都引發了激烈的反對聲音，而它是否真的會讓美國再次偉大雖然是未知之數，但它們卻足以對美國的國內經濟和美國的國際信用造成重大傷害。

中國與世界重構國際秩序

一些西方學者和觀察家認為美國戰略撤退行為是要重塑國際秩序，讓「大美帝國」逐步走向終結，並讓大國競爭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他們猜測特朗普是要把世界劃分為幾個勢力範圍，其中西半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所以必須吞併加拿大、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而亞洲和歐洲則分別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不過，特朗普卻從來沒有公開表示他有此「三分天下」的意圖，而支持特朗普的右翼專家和學者也沒有公然提出過這種建議。不過，一些美國政治精英比如國務卿魯比奧（Rubio）確實公開認為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multipolarity），而美國只是其中的一極。然而，事實上，特朗普卻是首位宣告中國是美國必須遏制的「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的美國總統。從政治邏輯角度看，美國要再次偉大的話，則特朗普便絕對不能讓中國與美國平起平坐，更難以接受中國超越美國，反而必須要加大力度阻止中國崛起。對特朗普來說，美國的盟友，無論是歐洲國家或者是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澳洲，不但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和幫助有限，甚至是某種戰略累贅，所有必須減少對他們的付出，尤其要迫使他們對自己的安全和發展承擔更多責任。然而，為了遏制和孤立中國，特朗普還曾以威逼利誘手段強迫美國的盟友協助和配合美國對中國的敵對行動，即便他們會因此而要付出沉重代價。同時，為了遏制和打擊中國，特朗普希望通過以對俄羅斯有利的方式結束俄烏衝突，並藉此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和誘使俄羅斯疏遠中國，從而弱化中俄的戰略合作。

總的來說，「大美帝國」的沒落並不代表世界走向和平、穩定、公平和發展。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和角力將會日益熾烈、「叢林法則」成為國際關係的準則，國際秩序越來越難以維護，中美之間的全方位鬥爭將會此起彼伏。在中美雙方的力量對比越來越對中國有利和美國的盟友又各自有自身利益盤算的情況下，美國遏制和孤立中國的圖謀不可能成功，反而會加快美國的衰敗。由於俄羅斯與中國的利益深度交融，加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歷過西方的多番愚弄，特朗普分化中俄的陰謀不會得逞。不過，在美國成為了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後，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西方國家願意更積極與中國建立或改善關係，而中國亦會更積極與世界各國探討重構國際秩序的事宜。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歐洲對美國的幻想正在破滅



國際觀察

宋魯鄭

特朗普入主白宮一個月，已令歐洲處於前所未有的地緣困境：東有俄羅斯，西有美國。正如前德國外長菲舍爾所說：美俄軸心對歐洲是即將來臨的噩夢。

從歐洲角度，俄羅斯只是威脅到安全，但美國卻在幾乎所有層面都構成了挑戰：拋棄盟友和烏克蘭、否定歐洲也就是西方的價值觀、對全球挑起貿易戰。特別是公開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領土野心，直接威脅到西方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從地緣政治角度，全球有四大力量：美、歐、中、俄。由於歐洲支持烏克蘭、制裁俄羅斯，歐俄戰略對立。現在特朗普日益親俄遠歐，不僅幫助俄羅斯走出外交孤立、未經談判就接受俄羅斯的主要條件，還在聯合國與俄羅斯共同否決涉烏提案。已經舉行的美俄兩輪談判都將歐洲排斥在外。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唯一合理的地緣應對之道是轉向中國。一是其他國家如日本、印度、巴西等國力還弱，而且它們還在竭力討好美國，不可能為了歐洲和美國

翻臉。二是中美戰略博弈是當今國際關係的主線，不可調和。中國即使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但只要實力還在，美國也不會放過。中國需要歐洲和一切力量來對沖美國的壓力。所以儘管美國將歐洲排除在談判桌之外，但中國卻明確支持烏克蘭問題上歐洲不可或缺。歐洲聯手中國代價低，見效快，更易打中美國的軟肋。

被「溫水煮青蛙」的歐洲

然而奇怪的是，到現在歐洲仍然沒有任何行動，哪怕口頭上都沒有。這當然不是歐洲訥於行，而是有很多因素。

第一，歐洲對美國還存在幻想，還在竭力勸說美國改弦易張。法國總統、英國首相、波蘭總統、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紛紛前往美國會見特朗普就是這一心理的體現。馬克龍甚至勸美國不可能和中國、歐洲同時打貿易戰。言外之意，我們是盟友，要想贏得和中國的競爭就需要和歐洲合作。

第二，特朗普到目前還沒有對歐洲核心利益造成真正痛徹心扉的傷害，更多的還僅停留在口頭上的威脅和政策宣示。

歐洲核心利益有兩個。首先當然是安全。特朗普對俄政策變化雖然對歐洲的安

全有重大不利影響，但目前和俄羅斯的談判只是剛剛開始，還沒有形成協議。如果以美國和烏克蘭稀土資源談判為例，一開始是完全不平等條約，到最後談出來的卻是尚可接受的結果。美俄談判最終結果是否是同樣的情況，歐洲仍在等待。其次則是制度的合法性。特朗普2.0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開始打價值觀牌。這集中體現在馬斯克和副總統萬斯對歐洲內政的干預，即對極右民粹主義的支持。萬斯在德國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批評歐洲不民主、限制新聞自由、違背法治，以及會見極右政黨領導人都是挑戰歐洲制度的合法性。但到目前還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傷害。德國大選仍然是傳統政黨獲勝。至於貿易戰雖然已經宣布了，但對於大國來講，經濟往往是第二位的，歐洲也有能力承受和反擊。

第三，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就把中國當作頭號威脅，認為是美國有史以來面對的最危險且勢力均敵的對手。所以歐洲認為可以緩靖之法以拖待變，判斷特朗普早晚會把主要精力轉向中國，中國也肯定會反擊。到時，美國或會放過歐洲甚至需要歐洲的支持，而且中國也更需要歐洲。不管面對哪一方，歐洲都將處於最有利的談判位置。

第四，歐洲仍然不相信美國的特朗普化是長期的趨勢，認為最多再忍受四年，民主黨重返白宮就可以完全逆轉當前的形勢。

第五，多年來歐洲部分政客和媒體對中國「妖魔化」，把中國歸於俄羅斯、朝鮮和伊朗行列。所以和中國合作既不符合政治正確，也從心理上難以接受。以中法關係為例。根據民調，對中國不認同的立場從本世紀初的40%左右上升到2020年的70%，同一時期美國也僅為73%。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面對法國媒體所稱的巨大挑戰「美俄軸心」，歐洲到目前仍然是拒絕打「中國牌」。

目前歐洲政治人物對美國最強硬的是法國前總統奧朗德，但也只是提議堅決回擊，打痛美國，造成重創。卻沒有提議和中國聯手。奧朗德擔任過總統，不可能不知道地緣政治以及「中國牌」的效果。

對美緩靖的下場只有一個

儘管如此，隨着形勢的發展，歐洲對美國的幻想正在逐一破滅。波蘭總統因為特朗普遲到而等了一個半小時，原定一個小時的會談卻僅談了10分鐘。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美國國務卿的會面突

然因所謂「日程問題」在最後一刻取消。更令高傲的法國難以接受的是，馬克龍總統2月24日訪問美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希望已經說服特朗普不要同時對歐、中打貿易戰。結果26日特朗普就宣布要對歐盟徵收25%的關稅。

從這個趨勢來看，美國對歐洲核心利益的嚴重損害也不可避免。2027年法國大選，美歐的博弈將會非常激烈，或許美國支持的極右勝選，歐洲才能清醒過來，但恐怕悔之晚矣。歐洲今天對美國緩靖的後果，不會因為中美博弈是主要矛盾而有所改變。二戰歐洲對德國的緩靖，結果是首先害了自己。

現在歐洲確實應該拋棄能影響特朗普、美國未來四年會再變天的幻想，主動糾偏對華輿論，與中國聯手。應該說，前總統奧朗德對此還是有非常清醒的認識：「美國總統只懂得權力平衡，歐洲不應該希望哄着特朗普，也不應該試圖說服他。」「特朗普渴望脫離歐洲，擺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的跨大西洋關係。」他更警告：美國不再是我們的盟友。處於十字路口的歐洲，如何選擇將決定自己未來的命運。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